

黨報「轉型困境」的政治文化分析： 以中央日報為中心

唐海江*

投稿日期：2008年1月17日；通過日期：2008年4月26日。

* 作者唐海江曾任世新大學舍我紀念館研究員，現為湖南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副教授。e-mail: haijiang_tang@126.com。

《摘要》

從中央日報的興衰，引申出黨報「轉型困境」命題：即以革命為任務的傳統黨報，在民主轉型中遭遇挫折的一般性問題。

本文跳脫從制度、權力、產業等面向，挖掘民主轉型中政治文化的多種內涵，與中央日報轉型困境的關聯性。文中以黨報組織與政黨、社會三者的互動為分析框架。

黨報組織與黨的互動上，以威權人格，和權力本位觀念為核心的傳統政治文化，造成黨報組織的文化維持功能。在黨報組織與社會的互動中，由族群動員帶動的激進民主文化導致黨報與黨外勢力的「積累對抗」，形成政治化和激進化的心態。在此機制下，中央日報的論述陷入看似奇怪而又「合理」的景觀中：一方面是意識形態的僵化和虛偽，缺乏以一種更有意義，和充盈的內容來填補，以適應民主社會的需要；另一方面，論述的轉換，與原有意識形態的價值根基互為抵觸，形成急劇的斷裂與翻轉，並以「民主」的工具性運用為代價。

文章最後，從中央日報轉型困境問題，延及臺灣主流媒體黨同伐異的現象，並提出黨報在民主轉型中應該排除二元對立的思維模式和心態，擴大內容的開放性、協商性和公共性，並提出加強黨內民主建設等問題。

關鍵字：黨報、轉型困境、政治文化、中央日報

壹、前言

2006年6月1日，中國國民黨中央機關報——《中央日報》黯然熄燈。聯繫《中央日報》在臺灣民主轉型中由盛而衰，及至最後停刊的歷程，無不讓人對黨報¹與民主轉型的關係產生想像。回顧上世紀中葉以來黨報這一媒介生態在全球的遭遇，包括蘇共黨報（張丹，2001: 123-127）、北歐黨報（Hoyer, 2005: 75-94）、東歐諸國黨報，以及大陸黨報的境遇（孟建，1997: 107-113；方曉紅，2004: 90-94），不難引申出黨報「轉型困境」這一論題，即以革命為任務的傳統黨報，在民主轉型中遭遇挫折的一般性問題。

如果斷語民主化與黨報是天生矛盾，或以個案（前蘇聯、東歐為例）就此作結，也許只會徒增困擾。其因不僅在於民主的內涵頗具歧義，³同時，民主轉型附及的社會、經濟和文化等變項達成的不同脈絡，無不使此企圖落空。⁴

關於《中央日報》的衰落，至今尚無正面論述，少數論者只是從各自視野旁涉其意：一是經濟學的，將中央日報作為一般性的產業，突出市場競爭中的弱勢（如發行競爭、企業化經營、新聞和版面競爭）（許甘霖，1997: 175-208；蘇蘅，2002: 90-102）；二是傳播政治經濟學，將此間國民黨黨營事業在臺灣的歷史化約為權力與市場的交換過程，認為隨著國民黨權力的消退，由權力所支撐的黨報，必然在市場上衰落。第三種取向強調制度因素對於中央日報的影響，如解嚴、政黨輪替等因素（張宏源，1999；黃東烈，2002）。

上述論述揭示了一些重要原因，但由於各自沿用框架的限制，對於黨報轉型困境形成的認知，又難免存有偏頗。如，經濟學視角從經濟理

性主義出發，將《中央日報》作為一般商業性媒體處置，可能忽視黨報極為特殊的政治性。政治經濟學路徑對黨報在民主轉型中的組織行為過於淡漠，難以展現黨報在臺灣民主轉型中的複雜情節和細部行為。強調外部制度力量對黨報的衝擊，則有可能忽略民主轉型中更為複雜而深層的因素，如文化、觀念和思想上的多重性，這也是經濟學視角和政治經濟學路徑所遺缺的。

本文之所以從政治文化面向切入該論題，主要基於兩點：一，制度變遷一般是民主轉型的關注重心，在制度背後，也許更為重要的政治文化的複雜境遇，往往未及深究。對於本文而言，其意味著跳脫單純從制度、權力、經濟等面向分析轉型困境之偏向，挖掘民主轉型背後政治文化的多種結構，與黨報轉型困境的關聯性。二，由黨報的本質屬性所決定。從對黨報的含義看，其本質是一種意識形態的工具，一種政治文化的功能實體（唐海江，2007: 14-15）。列寧在《從何著手？》中宣稱，報紙不僅是集體的宣傳員和鼓動員，也是集體的組織者（列寧，1901: 35），其意在黨報具有特定的政治文化的社會化功能。依照葛蘭西《獄中劄記》之意，黨報是一種建立文化領導權的機制（盧曉嵐，2006: 75-76）。這種觀念也為蔣介石等國民黨權力核心所認同，在其看來，黨報負著「革命的責任」，並強烈批判為賺錢而辦報的傾向（蔣介石，1940）。

政治文化概念自阿爾蒙德·鮑威爾等人於《公民文化》一書中，在1950年代提出來之後，學界有著不同的理解。本文將政治文化視為政治心理，和政治思想和價值觀兩方面。前者是政治文化中直觀的、感情的、潛在的部分，後者是政治文化中較具理性的層面，具有較明確的表現方式和顯性的特點，二者交織於一體（唐海江，2007: 24）。

臺灣轉型中的政治文化問題，日漸為人注意。1980年初，臺灣部

分學者已開始對島內政治文化進行實證研究，分析臺灣政治生活中的威權性格和民主文化（胡佛，1998a: 5）。此論題在臺灣民主制度框架確立後，對於民主鞏固問題的分析中逐步放大，牽引出民主轉型中的政治文化發展和培育的問題（羅伯特·達爾，1997: 97；黃秀瑞，1996: 64），逐步離析出政治文化結構中複雜的面向，如政黨的威權心態、民粹心理、族群意識，以及傳統與後現代的政治文化分際等問題（彭懷恩，1997: 206）。

因此，本文的問題是：在臺灣民主轉型中，政治文化與黨報轉型困境，發生了何種聯繫？由此我們又能從這種聯繫中，為黨報的發展找到何種含義？本文主要將中央日報轉型困境的分析，置於黨報組織、政黨與社會的互動框架內進行，集中在三個面向：一，是黨報組織文化。此面向分析黨報組織對於政黨的認同方式和合法性尋求，尋找其中的政治文化關係。⁵ 二，黨報組織與社會力量的政治文化互動的分析。即從社會層面的政治文化，揭示黨報在民主轉型中如何與社會力量進行政治文化互動。三，分析如此政治文化關係在《中央日報》論述中有何表現和變遷。

貳、傳統政治文化與黨報組織的「文化維持」

傳統政治文化的基本特徵是，家長本位意識和權力本位意識（馬慶鈺，1998: 63）。在古中國，家長本位意識，已超出家庭走向社會，並在帝王君主那裏獲得實現，形成社會的威權人格。其特徵包括：思考方式上的刻板，反對內省；對於上層順從，毫不批判；缺乏容忍異己的精神等（江炳倫，2002: 160）。

《中央日報》遷台後的近四十年，臺灣社會基本處於「卡裏斯馬型

式」統治的威權社會之中。蔣氏父子相承，建立以家族為核心的統治集團，這種威權社會體制和管理方式成為傳統政治文化續生，並在民主轉型中延續的潛在條件。

國民黨的黨報管理模式源於 1920 年代國共合作時期對「蘇聯宣傳模式」。該模式將黨報置於中宣部管理之下，而歷任中宣部長非蔣介石嫡系，蔣介石不久遂將《中央日報》劃出中宣部，直屬中常會，建立社長負責制，社長由蔣直接委任，以保障蔣的直接控制（方漢奇，1996: 377）。1947 年，《中央日報》改制，建立董事會，設常駐監察人，董事長和社長人選均須中常會通過，進一步強化權力核心對報社的控制。中央日報在臺發行近六十年，該模式幾未被觸動。

直接、集中的管理模式決定了黨報組織的合法性主要來自上層權力核心，這也成為理解《中央日報》組織文化的關鍵性維度（蔡銘澤，1995: 78-80）。因此，對其內涵，可從中央日報高層人事變動中獲得大致詮釋。國民黨來台後中央日報歷任董事長、正副社長與總編輯資料，詳見文末附表一、二與三。

報社主政者大多在政治大學（前身）受教，國防研究院和革命實踐研究院也是重要的受訓基地。政治大學前身為中央幹部學校，在 1929 年改名為中央政治學校，後改為今名。該校原為國民黨黨校，是革命時期國民黨幹部人才的主要培養基地，蔣介石為第一任校長。在對中央政治學校學生的一份勸勉詞中，蔣提出將「健全的人格」，「革命者的道德」，「確定的思想和信仰」作為人才的目標（秦孝儀，1984: 433）。威權時期，這種道德、思想和信仰的含義，由原先的三民主義轉為對反共革命的忠誠。

《中央日報》的高層主管，大多在政治大學進行正規學習，或與政治大學有密切關聯。在社長和董事長級別的，在報禁開放前，主政者有

馬星野、蕭自誠、吳俊才、潘煥昆、曹聖芬、姚朋、黃天才；報禁後才逐步減少，只有少數人如石永貴、朱宗軻、邵玉銘、詹天性等出身政大，但不少在國外已經拿到研究生學位。在副社長和總編輯層次的，威權時代，基本上來自政治大學，如錢震、林家琦、趙廷俊、邵德潤、薛心鎔、王端正、許志鼎等均屬此列。

革命實踐研究院和國防研究院均以「反共復國」為目的而成立。于1949年成立的革命實踐研究院以「革命必先革心，實踐就是力行，研究在求發展」為宗旨，企圖塑造學員「革命精神」、「戰鬥意志」和「雪恥復仇，殺身成仁之決心」（革命實踐研究院，1949: 1-28）。至1953年5月，該院推動25期教育訓練，重心置於確保台澎基地，貫徹中國國民黨的改造。當時國民黨要員，包括《中央日報》主要領導成員，均須在此受訓。如，楚崧秋在研究員培訓時，受到院長蔣介石任的召見（章益新，1994年9月6日）。國防研究院于1958年成立，其目的是為國民黨政府培養反共復國的領導人才（國防研究院，1959: 1）。第一期學員開學典禮上，蔣介石提出該院的宗旨是為反攻戰爭奠定一種「勝敵而益強」的基業（秦孝儀，1984: 283）。

從政治社會化的層面看，教育是個人政治意識和信仰形成的常規機制。在威權時代，與蔣介石的個人政治信仰有著密切關係的政治大學、革命實踐研究院和國防研究員，便扮演著政治社會化的關鍵角色，成為報社組織中高層人士認同威權人格的重要紐帶。這一意識不僅在威權時代佔據主導地位，而且通過組織的力量得以慣性式的延續，成為理解《中央日報》組織文化的切入點。

從起家背景看，在報禁開放前，《中央日報》的董事長和社長職位人選都有深厚的政治背景，新聞從業經歷則相對輕視。即使有一定的新聞從業經歷，但是要真正能夠在《中央日報》的主政位置上長期穩定，

往往要有政治上的憑藉。從董事長的職位變更看，這期間短暫執政《中央日報》的人物，如國民黨元老陳立夫、以新聞從業為背景並有行政院新聞局局長背景的董顯光、以及與董性質類似的胡健中，都只能算是過渡性人物。從社長職位看，馬星野、蕭自誠、陳訓恂、阮毅成均具一定政治基礎。後者對新聞業務並不熟悉，其奉調《中央日報》社長時，諸多主筆紛紛離走（阮毅成，1980: 94-97）。他們大多擔任過被蔣介石極為看重的部門——「國民黨中央第四組」的領導職務，但在《中央日報》的歷史上尚屬短暫。這一點，雖馬星野也不例外。在發表了有關「日報」和「中央」誰先誰後的言論後，馬星野被調離曾誓死忠誠的新聞工作崗位而遠赴他鄉（馬星野，1981 年 1 月 31 日）。

報禁期間，在《中央日報》主政期較長的當屬陶希聖、曹聖芬和楚崧秋。與前述人事的相同點是，三者均有著顯赫的政治背景。陶希聖在任中央日報董事長前曾為國民黨「中宣部」部長，國民黨政府遷台後任「國民黨中央設計委員會」主任和「國民黨中央第四組」主任等要職。曹聖芬也曾擔任過「第四組」主任，楚崧秋則擔任「第四組」副主任。更為重要的是，三者有區別於前述人士的共同點是，他們均與「兩蔣」保持密切的私人關係。陶氏在南京曾任蔣介石侍從室第五組少將組長，曹氏曾任軍委會委員長侍從室速記、秘書、國民政府秘書，楚氏在中央政校研究部就讀時曾任該校教育長蔣經國的秘書，後在臺灣成為蔣介石的侍從秘書。

這一對應關係似非簡單的偶合。如後兩位，曹聖芬在《中央日報》工作 24 年，主政期間值從威權至民主轉型的啟動期。楚氏主政時值報禁開放前，報業承受著外界的劇烈衝擊。在報社業績初顯下滑的背景之下，二者地位仍然堅固，這不能不讓人從這種個人忠誠中獲得想像空間。以曹聖芬為例，在一篇描述其作為蔣的秘書首次拜會蔣介石時的回

憶錄中顯露此意。其中有一段稱：

會客廳面積不大，裏面擺放著兩組沙發，校長立在靠窗的一組沙發面前，我行過禮後，校長示意叫我坐，我想應該立著回話。校長含笑問了我的年齡籍貫，家庭情形，便教我幫助（蕭）自誠兄努力工作。校長的目光是威嚴的，然而我這次感到的不是威嚴而是慈祥，那澄澈的眸子中流露無限的溫暖，有如冬日的陽光（曹志漣，2002: 31）。

楚崧秋則通過另一途徑述其心態。1977年，因刊出許信良出書廣告，社長楚崧秋「奉命」辭職。辭職當天，楚氏「徑往慈湖謁陵」，自我感覺是，因其是蔣老先生親自指派的最後一任社長，「冥冥中應該有所交代」。其潛意識裏，接受《中央日報》社長是受了蔣介石的託付，未能完成任務，則有負上恩。在走出中央日報社，回顧其從業史，楚氏仍引用宋朝鄭思肖的詩句「生得貞心鐵石堅，肯將識見與時遷」以表心志（呂芳上，2001: 117）。

如果說威權時期《中央日報》高層人事的頻繁變動，表現的是威權人格特有的個人隨意性和偶然性（這一特徵在大陸就已表現出來），⁶那麼，這種個人忠誠則是此種隨意性和偶然性的調節機制。在此心態下，辦報作為盡忠卡裏斯馬式人物的方式，已無可厚非。其回饋則是對下屬的信任和合法性的給予。因此，「代表蔣先生說話，才是書生立言之道」，成為黨報撰述者的信條和規則（彭歌，2002: 289），「《中央日報》代表著蔣介石政府及個人」（馬之驢，1986: 388），如此作風顯示出來的傳統政治文化特徵就清晰可見。

與威權人格相聯繫的是權力本位意識。權利本位的前提是政治的泛化，即國家與社會、政治與經濟的一體化。在古中國小農經濟基礎和社會等級制度下，國家和政治的功能得到極度膨脹，權力成為最有價值的

生產和生活工具，進而成為社會的思維定勢。威權時代的臺灣，國民黨對於臺灣社會和經濟資源的分配權，以及國民黨的官僚體系，成為塑鑄權力本位意識的基礎。

在《中央日報》的社長職位上，從曹聖芬到黃輝珍時期，期間除了少數年齡到期或因特殊原因自動辭職外，一般是官階上升。在威權時期，是由其他部門到《中央日報》任職成為升遷的象徵。在報禁解除後，中央日報的地位降低，這個時候的升遷則變成由《中央日報》社長升為中央社社長、中視總經理，或者是文工會主任。在威權時代，因權力本位意識有著個人忠誠的遮蔽顯得並不突出。但是，也難掩其基本性質。最富戲劇色彩的一幕發生在 1977 年代初，作為董事長的曹聖芬與作為社長楚崧秋之間發生內鬥，最後以楚被「貶」出局告終（呂芳上，2001: 115），此事件成為威權時代權力本位意識操控報社組織運行的生動註腳。

解禁後，卡裏斯馬型人物消失，報社主政者的合法性來源被割裂，黨報組織如何獲得新的合法性認同，以填補由此騰出來的「真空」就相當重要。

1988 年李登輝上臺後，對以兩蔣勢力為依託的《中央日報》並不像兩蔣那樣重視（江偉碩訪談資訊，見附表九），這無疑降低了《中央日報》在國民黨權力體系中的位置，進而帶來廣告和市場資源逐步喪失的多重效應。主政者在新環境下為獲得黨內核心的支持，不惜成為黨內鬥爭的工具。「二月政爭」期間，《中央日報》主政者就力撐「主流派」，通過「諤諤篇」與「政海微言」等專欄，炮口對內，集中火力攻擊「非主流派」（李克強，1990-07-20: 4）。在唐盼盼主政時期，極力配合李登輝施政，卻是「熱臉挨了個冷屁股」，遭李登輝的嚴厲批評（游其昌、謝公秉，1996 年 8 月 22 日: 6），最後被迫提前退休。在黃

輝珍主政時期，《中央日報》緊隨權力核心，報份雖無明顯長進，主政者則升任文工會主任。

如果將民主轉型前後，《中央日報》主政者對黨內權力核心人物的認知和心態進行比較，其實很難發現有何區別。同樣是對核心人物的無意識認同，同樣是權力本位思維發揮著作用。中央日報社編輯部的一位資深人士對於解嚴後《中央日報》主政者的如此思維和心態評論道：

報禁開放後，隨著李登輝的「執政」，《中央日報》喪失了與最高當政者的直接關係，因而導致後繼的諸多主政者極力尋找權力上升的辦法。《中央日報》於是演變成少數主政者搏取權力核心歡心的工具。他們眼睛朝上，討上級歡心，只面對上級，以上面滿意不滿意為標準（馬西屏，2007，訪談資訊詳見附表九）。

權力本位意識帶來的另一後果是派系意識。國民黨本身就是一個派系思想極為嚴重的政黨。1950年，蔣介石在總結大陸失敗的教訓特別提到黨內派系問題，推動其在50年代初採取措施清除黨內派系的殘餘勢力。但隨著島內政治生態的逐步成長，黨內衍生出了官邸派、政學系、救國系等派系（陳明通，1995: 172-173）。在《中央日報》內部，威權時代頻繁的人事更替，也不乏因派系問題這一潛在因素而遭排擠的（石永貴，2007，訪談資訊詳見附表九）。後來經過調整才逐步變為以官邸派為主導的組織主幹。但是，蔣經國過世後，報社組織所依賴的派系面臨新的調整。新的血液灌入後，並不能馬上改變原有的派系色彩。⁷最終只能導致新增力量在外尋求更多的幫助，造成派系意識、權力本位思維以及威權人格間的聯動。

艾森斯塔德在《帝國的政治體系》一書中，以「文化維持」來描述中國傳統政治文化的組織功能。依其理解，傳統政治文化的功用在於強

調「在傳統及與之聯繫著的那個特定集體的範圍之內特定文化傳統和秩序的維持，以及這一傳統和集體對所有異己因素的吸收」（艾森斯塔德 / 閻步克譯，1992: 230）。換言之，在傳統政治文化結構下，威權人格、權力本位和派系意識的交錯，不僅使得報社組織缺乏應對外界市場挑戰的適應能力和創新能力，也不利於組織自主性的生長。

固然，《中央日報》主政者內，有過堅持專業辦報的改革理念。他們不少還在西方研習新聞學，受到西方新聞自由觀念和專業理念的影響。馬星野曾在密蘇裏新聞學院就讀，歸國後在政大創辦新聞系，提倡自由和專業等新聞理念，使一大批後來成為《中央日報》骨幹力量的學子浸潤其中，並在《中央日報》24 周年社慶時，提出「三原則」勉勵報社同仁（《中央日報》，1978 年 2 月 1 日）。又如曹聖芬，依照西方對於專業的理解，提出服務、專門教育、對專業專心致志、高度的熱忱、專業信條等新聞專業內涵（曹聖芬，1956: 3）。石永貴主政時期也曾試圖走專業辦報道路，並提出仿照紐約時報的策略（石永貴，1990: 45、55），但其結果卻與原初意旨迥異。特別是涉及到重大原則性問題時，就「自然而然」地按照核心人物的標準加以處理（薛心鎔，2003: 224-227；薛心鎔，2007，訪談資訊詳見附表九）。這種「自然而然」的背後已昭示出業者已將傳統政治文化認同內化為自身思維的一部分，難免抵耗甚或淹沒了專業自主的追求。

參、激進民主文化與黨報——社會間的互動

民主化的一個含義是社會的多元化、自主性。然「社會」一詞，邊界模糊。西方學界晚近的理解主要在「市民社會」層面。如依據 Larry Diamond 的理解，市民社會是一個義務的、自動的、自足的、自治於政

府之外，而受法治或共同的規定所規範之組織性社會生活的範圍（Diamond, 1994: 5），它是民眾向執政者捍衛公共利益的場所。胡佛則用國家社會、政治社會與民間社會進行分別表述（胡佛，1998b: 14）。本文從黨報的功能入手，強調黨報的社會化功能，「社會」的含義不僅涉及市民社會領域，也包括非本政黨統轄的政治社會領域。

對於轉型期臺灣社會的政治文化，彭懷恩用「後現代」一詞加以定性，其特徵是：原有文化霸權成為反對的主要對象，全然喪失了合法性；政治共識式微，社會呈現異質性、分裂性的心理取向（彭懷恩，1997: 220-222）。這種徹底的反威權性格，與拉米斯（C. Douglas Lummis）的「激進民主」（Radical Democracy）有著類似含義（道格拉斯·拉米斯，2002: 14-18）。激進民主不僅強調對立與衝突是民主政治的基本性格，甚至將衝突解釋成為民主政治的本體，認為民主化的動力在於對抗任何形態的宰製性權力及其壓迫，具有徹底的批判性和不寬容性（蔡英文，2005: 1）。

國民黨從大陸退居臺灣，要獲得臺灣本土社會的正當性的認同，製造意識形態、尋求合法性成為主要任務。因此，統合主義成為當前處理威權時期政治體系與社會間關係的中心詞彙（丁仁方，1996: 213-232）。此種「統合」中是否存有獨立的「社會」，尚屬疑問。1960年的雷震案中，時任「第四組主任的曾虛白就質疑雷震提出的「社會」對於政黨的監督之說，認為臺灣無所謂「國家」與「社會」的「二分法」（曾虛白，1957年8月26日）。但1960年代末至1970年代，隨著臺灣工業化和教育水準的提，社會階層日益多元化（若林正丈，1994 / 洪金珠、許佩賢等譯: 153-158），在1970年代初臺灣當局「退出」聯合國的推動下，社會自主性受到較大激發就在所難免。

1970年代初，《大學雜誌》被稱之為是繼《自由中國半月刊》、

《公論報》等之後的中國自由主義的最後堡壘（南方朔，1979）。但它並非國民黨統治的根本反對者，只是希望通過社會力量，推動政治的革新。1972 年陳鼓應鼓勵學生運動的文章在此背景下出臺。與五、六十年代的《文星》和《自由中國半月刊》相較，此時期的自由主義論述並非直接挑戰國民黨的正當性，也無與現存體制針鋒相對的論述。但是，《大學雜誌》的批評及其解體，卻為這種激進民主文化的型塑拉開了序幕。

臺灣民主轉型中激進民主文化的形成，其根本在於轉型中建構出來的族群意識和省籍意識。這種意識針對國民黨的「中國意識」，延展臺灣獨立和「臺灣意識」的論述脈絡，構成 1970-1980 年代國民黨權力體系最為尖銳的解構力量。其中，黨外雜誌成為主要的論述場所和組織者（詳見附表四）。

1970 年代，《臺灣政論》和《美麗島雜誌》，不僅提供了「臺灣意識」的論述，而且成為組黨的機關。兩刊皆由臺灣本土基層力量組成。他們一面利用平面媒體作為宣傳工具，一面配合街頭選舉政見的發表，將黨外勢力有系統地凝聚，推動各項改革。臺灣政論雜誌追求「危險議題」，首度採用「臺灣」優先的命題。這種區隔與對立在 1979 年創刊的美麗島雜誌中被推向高點。該雜誌網羅全台各地黨外人物，以「臺灣意識」為主體訴求，形成美麗島政團（李筱峰，1987: 145）。在 1980 年代，黨外雜誌則以「遊擊」、「激進」的方式，此起彼伏，成為反抗威權、推動「臺灣意識」的主要載體。

「中國意識」和「臺灣意識」的衝突，已成為理解臺灣民主轉型的重要線索。該線索似已淹沒了民主轉型可能帶來的階級或階層衝突、分配的不正義等現代性問題（瞿宛文，2007: 183-188），社會與體制之間的緊張關係被族群問題所化約。這種論述無疑將牽引一般社會民眾的思

維模式，成為引爆社會心理的原點。

從互動的角度看，這種基於族群想像的激進民主特質，勢必導致體制的強烈反彈，特別是當它關係到執政黨本身的生死存亡時。⁸ 由此形成以國民黨政權與黨外勢力為主角的「積累對抗」模式，在其間製造出一種「敵對關係」（錢永祥，2004: 111-146）。如此情狀，《中央日報》已處於鬥爭的「風口浪尖」地帶，在認知社會力量時難免形成政治激進的心態。

1950 至 1960 年代，在解決國民黨權力體系與本土社會連接的問題時，《中央日報》利用從大陸帶來的一套論述模式，如採取報紙雜誌化的手段，刊設兒童、婦女、中副等專刊，對社會各個層面的群體進行意義連接。同時，通過地圖週刊、國際新聞等欄目，將臺灣放置於國際形勢下，促成本土社會人士的反共意識的生成。對於自由主義知識份子以及左派的知識份子，則表現出激烈的批判取向。如清洗左派人士及其刊物，對雷震及《自由中國半月刊》進行批判，關於救國團設立的論爭，拒登《自由中國半月刊》廣告等（林淇瀟，2005: 36），以整合社會意識。

《中央日報》在 1970 年代對《大學雜誌》的批判，有著為蔣介石連任鋪路的現實動機，但是也不能不說延續了前期批判自由主義的心理取向。也正是如此，以激進批判方式出現的黨外人士通過訴求「臺灣意識」以期對抗國民黨的「中國意識」論述時，其對抗性之激烈可想而知。對此，我們可以分析 1970 年代至 1996 年《中央日報》在話語權爭奪中有關反台獨的社論（詳見附表五）。

臺灣民主轉型中的族群對抗意識的建構，不僅促成《中央日報》對黨外運動和台獨論述的激烈批判，而且潛在地影響到其對於社會運動的判斷和認知。

《中央日報》主政者向來強調報紙的社會責任。在 1950 年代，當各民營報刊以社會新聞為競爭砝碼，造成新聞界犯罪、色情新聞氾濫時，《中央日報》便提出報紙的社會責任問題。1955 年，曹聖芬發表《自由而負責任的報紙》，表達該報對於社會新聞的立場，該文稱：

報紙原是一種推動社會進步的力量，而報紙的功能，一方面在表彰社會的光明，一方面在揭露社會的黑暗，表彰光明所以能激勵大眾，導人為善；揭露黑暗，所以使一切罪惡無所遁形，更無法藉掩蔽而滋生番長……是非既明，社會乃能因而進步。報紙要發揮這一功能，因而需要報導的自由，不受任何人的壓制；尤須報紙本身能基於負責的態度，其一切報導評論，均必須以法律為準繩，事實為依歸（曹聖芬，1955 年 11 月 20 日）。

強調報紙的社會責任，有著西方知識上的聯繫。1950-1960 年代，臺灣學界已開始傳播西方社會責任論（謝然之，1960: 2-6；胡傳厚，1960: 8-12），《中央日報》主事者在運用這種觀念時卻進行了加工轉化。社會責任論本是針對西方自由主義競爭時期黃色新聞氾濫而起，論者企圖通過報業良心和自律對自由主義新聞理論進行修正。曹氏的文章則主要強調報紙對於社會責任的發揮，必須遵循法律這一方面，這與社會責任論本身有著較大差別。其後，在 1960 年代臺灣所開展的新聞自律運動，也因有著強烈的政治背景而賦予了現實的、政治的含義（如「國家安全說」、「避免惡性競爭說」）（林麗雲，2004: 96-102）。這種認知模式被《中央日報》的後來者繼承。如楚崧秋強調「辨順逆、明是非、別善惡」的辦報原則，則將報紙的社會影響置於政治上「順逆」、「是非」、「善惡」等之間的二元對立的框架下進行論述，其間缺乏共同性的把握和整合的動機。

1980年代，臺灣社會運動進入高峰時期，據統計，從1983至1988年各年度，臺灣社會各種抗議行為急驟上升（吳介民，1990: 45）。對於此類社會運動，《中央日報》沿用既有的思維進行判斷和報導，特別是對於在1980年代中後期發生的農民運動、野百合學運等都給予激烈的批判。這種思維方式並沒有因制度變革有明顯改觀。在1989年的一篇社論中，《中央日報》抨擊臺灣部分媒體在社會運動報導中已成爲「造勢」和「作秀」的「急先鋒」（《中央日報》，1989年9月1日）。1990年，爲紀念該報創刊六十二周年而刊發的一篇社論，則將前期該報對於社會運動，和政治運動報導的理念進行總結，其呈現出來的認知方式與威權時期並無明顯差別，文章稱：

際茲政府致力於民主憲政之創進，民主自由的訴求日趨激越，而國人之法治觀念猶未落實，倫理道德日漸式微，社群人心，每多躁進；政治事件與社會事件，每於反法治反倫理的氣氛中，弄得是非不分，法理不明，益以極少數野心分子的挑撥煽動，騷亂之事乃層出不窮，導致社會人心惶惶不安，而部分媒體輿論不察，或竟亦隨之；本報面對此一複雜情勢，當仁不讓，秉春秋以責賢者之義，為振公理振人心發而為匡時振敝之論，願雖因此或略有不利於營運，然則本報何報？豈肯因此而裝聾作啞，甚或自甘卑下而降格以求（《中央日報》，1990.2.2）？

因此，當我們體會《中央日報》在批判1980至1990年代中期臺灣社會運動的價值時，不能不將其對於社會責任的認知和判斷（報格），置於激進民主文化的環境之下進行分析。⁹在激進民主背景下，「社會責任」已然墜入「二者擇一」的怪圈之中，責任意識已經定勢成爲絕對化的思維習性。這看似頗爲吊詭，同時又是何其合理！

也正是如此，曾任《中央日報》副總編輯，主管採訪領域的馬西屏直言：「轉型時期，一般民眾都喜歡聽反對的聲音，對於《中央日報》維護舊有的權力和意識，他們非常反感」（馬西屏，2007，訪談資訊詳見附表九）。「反感」的背後，不乏話語權爭奪中非理性互動之貽害。如此境況下，一些違背民主自由精神的舉措就自然發生。如 1990 年代部分反對黨所管轄縣市禁止訂購《中央日報》（秦富珍，1996-6-25: 2）就成為該模式下的必然產物，而其本身完全違背自由民主社會之精神。2000 年後，陳水扁政府拒絕為《中央日報》提供重要政治消息等等舉措（黃東烈，2002: 124），均未能繞離此種「邏輯」。

肆、政治文化與黨報論述的轉換

作為一個社會化的過程，黨報組織的政治文化特徵，以及黨報與社會之間的互動中所形成的政治文化，必將通過黨報的論述得以體現和表達。民主轉型所帶來的黨報的任務，就是生產一套適合社會和政黨發展的論述，實現意識形態的合理轉換，以為政黨獲取社會認同。然而，在傳統政治文化和激進民主心理的雙重機制下，《中央日報》的論述和意識形態轉換具有特殊的經歷。

1950 年 7 月，國民黨敗退至台後便開始黨的改造，將黨的屬性從原先的「革命黨」改為「革命民主政黨」（梁欽堯，1990: 106-107），強化民主集中制。後在七全大會上提出「反共抗俄、反攻復國」的方針，將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具體化為「反共」，這也構成威權時期國民黨內部的政治信仰。

在編輯政策上，《中央日報》積極配合反共意識形態的塑造，將反共放在是非曲直的終極標準上。中央副刊，則被確定成為「戰鬥尖

兵」，提倡「戰鬥文藝」。1973年設立的「大陸透視」專欄，專司揭露大陸的黑暗與混惡，「使其成為反映大陸苦難同胞新生的喉舌，和向自由地區軍民同胞反映匪區真相的一面鏡子」（《中央日報》，1973年1月1日）。同時，該報還連載反共義士撰寫的文章，如《飛向自由》、《立志東飛》、《我從地獄來》等。在1970年代，甚至不辨真偽，刊登揭露大陸當局對越南的殘暴統治的文章《南海血書》，引起一時轟動。直至1980年代，主政者提出辨順逆、明善惡、別是非等原則，將反共作為價值核心加以認定。

為了建構反共復國的意識形態，各個重大事件均能與其建立意義上的關係。這一點可以從1950-1970年代《中央日報》對有關重大事件的社論獲得瞭解。在1950年代初臺灣發起的經濟建設活動，《中央日報》的社論將其定義為「為著堅厚反攻大陸的基礎」；1954年的文化清潔運動及1966年發起的中華文化復興運動，也將矛頭指向中共的文化政策和文化性質，前者將「文化清潔」定義為文化鬥爭，後者則將中共的文化政策定義為全盤的反傳統文化，表現出鮮明的鬥爭意識。對於島內的政治事件，如劉自然事件、雷震事件和修訂出版法舉措，均能從反共的價值面向上獲得實施的合法性。連自然災害（八七水災），都一以貫之地從反共復國的訴求中獲得意義。甚至連日本佔領釣魚島事件，都能將其根本原因歸結為「共匪叛亂」所致。（詳見附表六）

通過意義牽連，反共復國的邏輯已經延伸到威權時期臺灣軍事、政治、文化、經濟、自然災害以及外交等活動的方方面面，而各種活動只有從反共復國的論述中才能獲得合理性。原本屬於國民黨實現三民主義手段的「反共復國」主張，在論述中卻成為崇高的價值目標，一種近乎絕對的價值標準。

固然，反共復國意識形態的建構，能夠在特定時間段達到動員民

眾、為當局內政外交謀求合法性的目的，然一但將其絕對化，在環境變化的情況下則可能完全喪失其合理性。1970 年代，隨著蔣介石當局「退出」聯合國，其外部空間受到嚴重壓擠，繼任者蔣經國不得不採取「臺灣化」策略，吸收臺灣本土才俊進入執政核心體系，集中精力開展島內建設，以夯實內部合法性（若林正丈，1994 / 洪金珠、許佩賢等譯：164）。但《中央日報》此間有關島內建設的訴求中，「反共復國」依然是中心點。（詳見附表七）

外部情勢的變化與內部論述價值的停滯，無疑使黨報意識形態的內容和形式之間形成巨大落差。1950-1960 年代原本能夠提供合法性的反共復國訴求，在新的形勢面前變成虛偽的辭令。除了借此打壓台獨言論外，黨報的諸等論述建構，與虛假的外敵進行長達十餘年之久「揪鬥」和「防衛戰」，其結果只能是論述的僵化和形式化，脫離島內民眾的社會生活實踐。

另一方面的問題是，隨著國民黨政黨性質的變化，即從反共復國轉向認同臺灣，極易導致黨報論述的急劇反轉和價值認同的內部緊張。

從政黨認同的角度理解，國民黨遷台後，以復興中華民國為主要目標，臺灣成為「復興基地」。1950 年代，蔣介石就以憲法為這一說法尋找依據，這也給當時籠罩於頹廢和失敗中的國民黨人以希望。在此邏輯下，1970 年代的經濟建設就使得臺灣成為中華民國發展的「樣板」。1988 年，李登輝上臺後，由於在黨內缺乏權力基礎，只能兼用權謀和民粹手法，推動國民黨的臺灣化，並在 1996 年當選總統後提出「認同臺灣」、「建設新中原」等理念，其內涵已經放棄了大陸。而《中央日報》的論述則緊隨這一價值，使得原有的政治文化認同急轉，幾近成為自身的反對物。對此，我們可以從 1980 年代後期至 1990 年代《中央日報》在反對台獨和認同臺灣的價值依據上尋找其變化。（詳見

附表八)

自 1970 年代以來，國民黨政權對臺灣獨立主張持極為鮮明的反對態度，《中央日報》反台獨的社論成爲一種常規性的機制。其反對台獨的理由主要基於三方面的價值訴求：一、民主化，二、民族歷史文化傳統，三、現實利益。但是在 1993 年，這些價值基點在論述中發生了變化。1993 年，代表國民黨傳統勢力的郝柏村下臺，國民黨政黨屬性開始向臺灣化轉向。1994 年，李登輝接受日本作家司馬遼太郎的採訪，作了「生爲臺灣人的悲哀」的表述，並指責「國民黨爲外來政權」，逐步明晰其認同臺灣的新意識形態。在這個時期，《中央日報》的社論在有關「認同臺灣」、「生命共同體」、「新臺灣人」和「新臺灣主義」的論述中，所依存的價值與原有的反台獨的論述中心有著根本性的差異，乃至走向了背離。

這一轉變至少體現在兩方面：一，在認同臺灣的論述中，《中央日報》已經拋棄了原本反台獨論述的民族歷史文化傳統這一價值基點，轉而以現實需要、現實生活場所等事實依據作爲訴求重心。在 1970-1980 年代，《中央日報》有關中國意識的論述，價值訴求集中在民族文化傳統和歷史方面，強調臺灣是中國文化的一種延伸。1990 中後期，《中央日報》論述則突出了臺灣認同方面意識形態的營造，在文化上所突出的是臺灣的本土文化（新文化）的意義，臺灣與中國傳統歷史文化之間的聯繫被淡化甚至被刻意磨損。

二，在關於民主化與臺灣的關係上，民主價值本是《中央日報》反對台獨反對本土化的訴求依據，但在 1993 年後轉而成爲認同臺灣的理由。在 1990 年代末，民主化成爲支持臺灣認同的核心。在意識形態的轉換中，民主，這一原本在轉型中的最爲重要的價值追求，幾成被操弄的說辭，成爲各種論述的工具。

也正是如此，在民主轉型期間，《中央日報》的論述陷入如此一種奇怪的景觀之中。一方面是意識形態的僵化，缺乏以一種更有意義和充盈的內容來填補，以適應社會的發展，遂使新（增量）的社會成員對其難以產生政治認同；另一方面其意識形態的轉移，又是以與原有意識形態的價值根基為抵觸為內涵出現的，造成與舊的社會成員（存量）的思維模式之間急劇的張力。特別是其以最為基本的民主價值的工具性運用為代價，不能不說是對臺灣「民主」轉型的一個反諷。

伍、思考和討論

本文的目的是希望分析出，這種非一致的、甚至與民主價值有著矛盾的政治文化結構，是如何交織於《中央日報》運作中的。這裏呈現的是一種，極為複雜的政治文化運作機制。其一是傳統政治文化因素，如威權時期所遺留下來的心態，和權力本位思維，它對民主轉型初期舊意識形態論述的維持，同時，在原有合法性基礎消失後，此種心態成為非理性追尋新權力核心、塑造與舊意識形態近乎對立論述的保障。如此脈絡不能不說耐人尋味。其次是民主激進文化的心理機制，則在無形中，與傳統政治文化運作機制相呼應，強化黨報組織的威權心態，甚而激起其論述的對抗性與衝突性，推動政黨——黨報——社會三者關係的惡性循環。

目前臺灣學界的黨報研究，已經落入歷史的塵埃而未省其意。這一情狀的出現，是否與本文開頭所指出的關於黨報與民主化，是天然對立的觀念有關，尚不得而知。嚴格而言，黨報作為一種意見的代表或提倡，是否必被排除在一個主張多元意見，和自由言論的民主社會之中呢？這種思維和心態的出現，或許也難脫本文所指的二元對立的、激進

民主的政治文化的窠臼。

不過，《中央日報》並非如此政治文化結構的唯一面對者。看近十餘年來臺灣主流媒體的言詞暴力和運作邏輯，「選邊站」、「黨」同伐異，以及不寬容心態，在媒體論述中的大面積流行，無不讓人發現如此政治文化操弄的痕跡，以致「當今臺灣主流報紙都是黨報」此類感歎頻頻。¹⁰ 其情狀，除了讓那些呼籲「黨政軍退出媒體」的自由主義論者，重新反省其政治心態之缺失外，也讓我們警醒於臺灣民主轉型中的政治文化「悖論」。

《中央日報》轉型困境的發生，有其特殊性，也有其普遍的含義。臺灣，作為一個政治名詞，其地位的未定性而造成的政黨意識形態的非理性，和社會民眾心理的激進色彩，無疑在《中央日報》轉型困境中發揮著基礎性的作用。族群意識、黨報論述的狹窄化、空洞化以及後來的背離趨勢，無不與此有著關聯。當我們在這種模糊而有爭議的背景下，探尋臺灣民主化中的黨報問題時，族群認同等形式合理性問題被置於中心地帶，價值合理性問題，如民主、理性、公正、進步、平等卻在無形中被邊緣化了。如此脈絡下，《中央日報》轉型困境本身所代表的意義，並非如人所願。

但是，從政治文化面向反思，《中央日報》的轉型困境之發生，應當能夠提供某些啟示。本文特提出以下兩點進行討論。

一是黨報在民主轉型中，如何塑造新的意識形態，以及塑造一種什麼樣的新意識形態。

意識形態的困境可以說是黨報轉型中的普遍性問題。在向民主和建設的階段邁進時，原有的意識形態勢必面臨轉換。這種問題在臺灣以「統獨」、「族群」問題表現出來，在其他地方可能以階層意識、種族意識、宗教意識得以表現。問題是，這種意識形態建構，是否就要以鬥

爭和對立的方式才能建立呢？當代文化研究論者關於「轉向葛蘭西」的呼籲，（陸揚、王毅，2001：59-68）對於我們對此問題的理解，仍具提示意義。葛蘭西在闡述其文化領導權理論時，特別強調意識形態的差異性，即文化領導權的確立，是以包容異質為前提的。進而言之，民主化進程中的社會，本是一個包含多種意識形態因素的場域，既是政黨集團確立文化領導權的必經之地，又是新意識形態的生長點，其關係非簡單的「是」與「非」的二元對立。對於執政黨來說，該政黨的意識形態，並非天然凌駕社會其他意識之上，它必須適應社會文化思想的複雜多元性，採取更為寬容、平等和民主的方式。葛蘭西提出的「協商（negotiation）」方式，就在於能夠以這種開放性和平等姿態，與其他意識形態溝通，並在這種協商中，豐富和發展新意識形態的內涵，爭得社會力量積極而直接「同意」，（安東尼奧·葛蘭西，2000：131-132）進而獲取文化領導權。

對於傳統黨報的轉型而言，如何迅速突破原有意識形態的歷史包袱，發揮黨報在意識形態建構和整合中的力量，就顯得非常緊迫和重要。《中央日報》衰落最關鍵的時間段，在於報禁解除前的十餘年時間，即社會力量和社會意見規模化呈現的時期。這要求黨報適時增加其內容的開放性和公共含義，吸取和整合社會各界意見，並在此基礎上提出新的意識形態，以此排除和化解來自各方面的衝突和對立。這在民主化帶來的政治價值多元化，和社會理性化趨勢下實乃首要的步驟。

這也涉及到另一問題，即黨報與政黨權力體系的關係問題。《中央日報》轉型困境之所以令人深思，基本點也在於政黨內部民主問題。國民黨撤退到臺灣後，所確立的統治模式，是以「兩蔣」的個人威權為基礎，《中央日報》的組織和內容總體上展示出這種性格。李登輝時代的權力鬥爭，和政黨性質的隨之變化，與政黨內部權力鬥爭帶來的專斷性

和缺乏協商民主不無關係。在如此作風下，《中央日報》的組織創新能力，和組織文化的活力難以生長、甚至成為黨內個別領袖意志的表達機器，就不足為怪。黨內民主和協商機制的建立和常規化，也許是黨報克服權力本位和專斷意識等因素拘束，建構政黨——黨報——社會三者良性互動機制的基點。

註釋

- 1 本文所指黨報，包括三層含義：1、經濟上主要由政黨出資創辦和支持；2、主要人事關係由政黨組織決定；3、目的在於進行政黨宣傳，以獲取、擴大社會民眾的支持和認同。
- 2 對於發展中國家和地區的民主轉型，其理解模式有：一是政治發展模式，其內涵頗為籠統；二是政治變遷概念，其抽象程度高，適用範圍也被無限制地拉大。三是政治轉型，指涉一種特殊的政治變遷，強調政權類型之間的轉換和改變，而民主化的核心過程主要就涉及到政治轉型過程（吳文程，1995）。由於政權屬性不一（起點），以及民主理論的差異（目標），民主轉型的論述和現實進程也複雜多樣。對於民主轉型本身的時段理解也有差異。如有的以為民主轉型應該就是兩個政權形態轉換的某一特定時間段；也有人主張將民主鞏固期加入進去。本文對於民主轉型偏向於從長時段加以理解，但論述集中在 1988 年前後二十餘年的時段內。
- 3 論者在探尋民主化與媒體的關係時，集中於媒體對於民主化的作用面向，如 Fox Elizabeth（1988）對於拉美民主化中媒體作用的探討，Zhao Yuezhi（1998）對於中國民主化過程中媒介作用的探討，McChesney. Robert W.（1999）關於媒體商業化對美國民主的批判

性論述，Peter Gross（2002）關於東歐媒介對民主化的作用分析。關於臺灣媒體與民主化的關係，也主要集中在面向（包澹寧，1995 / 李連江譯；李金銓，2004: 135-164）。但關於民主轉型對於媒體形態的作用，鮮有論述。

- 4 目前對媒體組織文化的分析取向包括：一是從組織制度框架出發，探討組織內部成員的自主權和決策權利（內部新聞自由），如蘇正平對於「自立事件」的分析，集中於組織內部的衝突（蘇正平，1996: 21-33）；二是關注組織內部的權力關係運行。如張文強對於報社組織內部的忠誠和新聞專業的忠誠的分析（張文強，2002: 29-61）。以上兩種取向均從微觀的層面探尋組織內部的關係，並沒有涉及到組織與外界的互動。
- 5 以《中央日報》重慶時期為例，1940 年程滄波因提出離開《中央日報》社長職位後，何浩若、陳博生、陶百川、胡健中等走馬而過，長者不及兩年，短者不及月於，以致國民黨中央一時找不到合適的社長人選（馬之驩，1986: 389）。
- 6 石永貴主政後，曾針對報社內派系叢生的狀況，提出「《中央日報》沒有別的派系，只有《中央日報》派」的主張，試圖瓦解派系的隔閡，但是其努力並不奏效（石永貴，2003: 381）。
- 7 王振寰在理解 1970 年代以來國民黨政權對於新興社會力量的態度時，用「退縮正當化」加以概括，其意指權力體系不僅不承認新興社會力量，而且去壓抑和反擊，並為了合理化其壓迫，進一步尋求原來支持者的認可和支持（王振寰，1989: 98）。蕭新煌在理解 1990 年代以來臺灣的族群意識發展時認為，外省、本省的二分思維在民間社會已逐步被社會文化差異概念所代替，但是政治圈內的人物卻不能跟上這一步伐，並且這種對立已經演變成「國家認同」

層面而被政治圈所擴大，由此加劇了政治社會之間的衝突（蕭新煌，2002: 23-24）。

- 8 朱雲漢分析指出，在統獨光譜左右兩端的政治勢力，彼此間已不存在起碼的寬容、信任或尊重；對立情緒已經凌駕到對民主程序的基本共識，所有的詆毀、醜化或打壓手段都可能被合理化。其結果是，朝野政黨間的互動模式已經超脫民主體制下的理性競爭，而近乎一場慘烈的政治鬥爭（朱雲漢，2004: 156-157）。
- 9 對此，1954 年，成舍我先生針對英美等國大報作為評論，指其雖非黨報，但是均是站在某一政黨立場，決不放棄批評的機會，也絕不掩飾他們對於某黨的擁護或反對。放眼臺灣，此言果是中的（成舍我，2007: 165）。

參考文獻

- 丁仁方（1996）。〈民主化對經濟現況的影響：威權統合主義的轉型〉，陳文俊（編），《臺灣的民主化：回顧、檢討與展望》，頁 213-232。臺北：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
- 〈為何增辟這一專欄〉（1973 年 1 月 1 日）。《中央日報》，第 8 版。
- 〈我國報業的先驅〉（1978 年 2 月 1 日）。《中央日報》，第 9 版。
- 〈千萬不要再做「造勢」和「作秀」的急先鋒了〉（1989 年 9 月 1 日）。《中央日報》，第 2 版。
- 〈一份屬於全中國人的報紙〉（1990 年 2 月 2 日）。《中央日報》社論，第 3 版。
- 方漢奇（主編）（1996）。《中國新聞事業通史》第二卷。北京：中國

人民大學出版社。

方曉紅（2004）。〈從「黨性原則」到「三貼近原則」：論中國黨報理論的發展與黨報改革〉，《南京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5: 90-94。

王振寰（1989）。〈臺灣的政治轉型與反對運動〉，《台灣社會研究季刊》，2(1): 98。

王曉寒（2000）。《白色恐怖下的新聞工作者：兼談人生的甘苦》。臺北：健行文化。

李連江譯（1995）。《筆桿裏出民主——新聞媒介對台灣民主化的貢獻》，臺北：時報。（原書 Berman, Daniel K. (包澹寧) [1992]. *Words Like Colored Glass: The Role of the Press in Taiwan's Democratization*. Colorado: Westview Press.）

石永貴（1990）。《勇往直前》。臺北：三民書局。

石永貴（2003）。《媒體事業經營管理》。臺北：三民書局。

成舍我（2007）。〈「黨報社論」是否「不值一讀」？〉，唐志宏（編）《成舍我先生文集——港臺篇 1951-1991》，165。臺北：世新大學出版中心。

列寧（1901）。〈從何著手？〉《馬克思主義新聞工作文獻選讀》，北京：人民出版社。

朱雲漢（2004）。〈臺灣民主發展的困境與挑戰〉，《臺灣民主季刊》，1(1): 156-157。

安東尼奧·葛蘭西（2000）。《獄中劄記》，曹雷雨等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江炳倫（2002）。《政治文化導論：理論與個案研究》。臺北：韋伯文化出版。

- 艾森斯塔德（1992）。《帝國的政治體制》，閻步克譯，貴州人民出版社。
- 吳介民（1990）。《政治轉型的社會抗議：1980年代》。臺灣大學碩士論文。
- 吳文程（1995）。〈臺灣政治轉型理論的分析架構的探討〉，《東吳政治學報》，4: 136-140。
- 呂芳上（2001）。《覽盡滄桑八十年：楚崧秋先生訪問紀錄》。臺北：中研院近史所。
- 李克強（1990年7月20日）。〈宋楚瑜：對外言論要有分寸〉，《聯合報》，第4版。
- 李金銓（2004）。〈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臺灣報業與民主變革的崎嶇故事〉，《超越西方霸權：傳媒與文化中國的現代性》。英國：牛津大學。
- 李筱峰（1987）。《臺灣民主運動四十年》，臺北：自立晚報出版。
- 阮毅成（1980）。〈我在中央日報工作的回憶〉，《報學》，6(5): 94-97。
- 孟建（1997）。〈市場經濟條件下黨報改革的系統觀〉，《南京大學學報》，2: 107-113。
- 林淇瀟（2005）。〈威權／霸權與新聞自由權——以1950年代自由中國的言論苦鬥為例〉，《臺灣史料研究》，24: 36。
- 林麗雲（2004）。《臺灣傳播研究史：學院內的傳播學知識生產》。臺北：巨流圖書公司。
- 阿爾蒙德·鮑威爾（1987）。《比較政治學：體系、過程和政策》，曹沛林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
- 南方朔（1979）。〈中國自由主義的最後堡壘——大學雜誌階段等量底分

析〉，《夏潮》，4(2): 50。

胡佛（1998a）。〈自序〉，《政治文化與政治生活》。臺北：三民書局。

胡佛（1998b）。〈臺灣威權政治的傘狀結構〉，《政治變遷與民主化》。臺北：三民書局。

羅伯特·達爾（1997）。〈民主文化與經濟發展〉，田弘茂（主編）《鞏固第三波民主》，臺北：業強。

胡傳厚（1960）。〈新聞事業的四項理論：從權力主義到社會責任論〉，《報學》，2(7): 8-12。

洪金珠、許佩賢等（1994）。《分裂國家與民主化》。臺北：月旦出版社。（原書：若林正丈[1992].《台湾——分裂国家と民主化》。東京大學出版會。）

革命實踐研究院（編）（1949）。《革命實踐研究院講習錄》，臺北：內部資料。

徐大同（1998）。〈政治文化民族性的幾點思考〉，《天津師範大學學報》，4: 32-34。

秦孝儀（主編）（1984）。《蔣公思想言論總集》。10: 433。臺北：中央文物供應社。

秦富珍（1996 年 6 月 25 日）。〈陳水扁砲轟中央日報〉，《聯合晚報》，第 2 版。

馬之驢（1986）。《新聞界三老兵：曾虛白——成舍我——馬星野奮鬥歷程》。臺北：經世書局。

馬星野（1981 年 1 月 31 日）。〈奉使虛隨八月槎〉，《中華日報》，第 6 版。

馬星野（1978 年 2 月 1 日）。〈給青年記者——新聞採訪應守什麼原

- 則》，中央日報，第2版。
- 馬慶鈺（1998）。〈中國傳統政治文化的發展邏輯〉，《政治學研究》，2: 63。
- 國防研究院（主編）（1959）。《國防研究院概況》。頁1。內部資料。
- 唐海江（2007）。《清末政論報刊與民眾動員：一種政治文化的視角》。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
- 陸揚、王毅（編）（2001）。《大眾文化研究》。上海：三聯書店。
- 張丹（2001）。〈真理報的歷史變遷與經驗教訓〉，《新聞與傳播研究》，3: 123-127。
- 張文強（2002）。〈媒介組織內部權力運作與新聞工作自主：封建采邑內的權力控制與反抗〉，《新聞學研究》，73: 29-61。
- 張宏源（1999）。《解構媒體環境變遷與報業發展趨勢》，臺北：亞太圖書公司。
- 曹志漣編（2002）。《一片祥和日月長：報人曹聖芬》，臺北：開元書印。
- 曹聖芬（1955年11月20日）。《自由而負責任的報紙》，《中央日報》，第2版。
- 曹聖芬（1956）。〈如何使新聞工作專業化〉，《報學》，9: 3。
- 梁欽堯（1990）。《政治發展與政黨轉型：中國國民黨民主化研究》。臺灣大學政治研究所碩士論文。
- 許甘霖（1997）。〈政治支配或市場邏輯：黨營事業概念的再檢討〉，《臺灣社會研究季刊》，28: 175-208。
- 陳明通（1995）。《派系政治與臺灣政治變遷》。臺北：新自然主義股份有限公司。

- 章益新（1994 年 9 月 6 日），〈楚崧秋先生的新聞世界（上）〉，
《中央日報》，第 18 版。
- 彭歌（2002）。《曹大哥歡慶九十》，曹志漣（編）《一片祥和日月
長：報人曹聖芬》。臺北：開元。
- 彭懷恩（1997）。《臺灣政治文化的剖析》。臺北：風雲論壇出版。
- 曾虛白（1957 年 8 月 26 日）。〈自由中國給我們的警戒〉，《中央日
報》，第 3 版。
- 黃秀瑞（1996）。〈臺灣政治文化變遷與政治民主化〉，陳文俊（編）
《臺灣的民主化：回顧、檢討與展望》。臺北：中山大學政治學
研究所。
- 黃東烈（2002）。《臺灣民主化對黨營媒體經營影響之研究——以中央
日報為例》。世新大學傳播研究所碩士論文。
- 新臺灣研究文教基金會（編）（1999）。《走向美麗島：戰後反對意識
的萌芽》。臺北：時報出版公司。
- 楊渡（1988）。《強控制解體》。臺北：遠流。
- 游其昌、謝公秉（1996 年 8 月 22 日）。〈李主席直指黨營文化事業沒
做好〉，《聯合報》，第 6 版。
- 道格拉斯·拉米斯（2002）。《激進民主》，劉元琪譯，北京：中國人
民大學出版社。
- 劉義周（2004）。〈政黨民主與臺灣的民主化〉，《臺灣民主季刊》，
1(1): 41-42。
- 蔣介石（1940）。〈怎樣做一個現代新聞記者〉，《新聞學季刊》，
1(3): 1-2。
- 蔡英文（2005）。〈基進民主理論的政治思辨〉，《政治科學論叢》，
23: 1-2。

- 蔡銘澤（1995）。〈大陸時期國民黨黨報管理體制的變化〉，《新聞與傳播研究》，2: 78-80。
- 盧曉嵐（2006）。《現代媒介文化——批判的基礎》。臺北：三民書局。
- 蕭新煌（2002）。《臺灣社會文化典範的轉移》。臺北：立緒。
- 錢永祥（2004）。《公共領域在臺灣：一頁論述史的解讀與借鑒》，李丁贊（編），《公共領域在臺灣：困境與契機》，頁 111-146。臺北：桂冠。
- 薛心鎔（2003）。《編輯臺上：三十年來新聞工作剪影》，臺北：聯經。
- 謝然之（1960）。〈新聞自由基本概念的演變〉，《報學》，2(7): 2-6。
- 瞿宛文（2007）。〈臺灣戰後經濟發展與民主運動〉，《臺灣社會研究季刊》，3: 183-188。
- 蘇正平（1996）。〈新聞自主的理論與實踐〉，《新聞學研究》，52: 21-33。
- 蘇蘅（2002）。《競爭時代的報紙：理論與實務》。臺北：時英出版社。
- Diamond, L. (1994). Toward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Journal of Democracy*, 5(3), 5.
- Fox, E. (1988). *Media and politics in Latin America: the struggle for democracy*. London: Sage.
- Gross, P. (2002). *Entangled evolutions: the media and democratization in eastern Europe*.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Hoyer, S. (2005).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Scandinavian party press. In S. Høyer & H. Pöttker (Eds.), *Diffusion of the news paradigm, 1850-*

2000 (pp. 75-94). Göteborg: Nordicom.

McChesney, R. W. (1999). *Rich media, poor democracy: Communication politics in dubious Times*.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Zhao, Y. (1998). *Media, market, and democracy in China: between the party line and the bottom line*.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附表

附表一：中央日報臺灣時期歷屆董事長相關經歷與背景

姓名	籍貫	教育背景	任職時間	職前新聞經歷	職前政治經歷
陳立夫	浙江 吳興	美國匹茲堡 大學採礦學 碩士、北洋 大學採礦系	1949.3- 1950.9		「國民黨中央評議 委員」，「教育部 長」
董顯光	浙江 寧波	密蘇裏大學 新聞學院	1950.10- 1953.3	創辦《庸報》，天津 《日日新聞報》主筆 ，英文《大陸報》總 經理兼總編輯	國民黨軍委副部長 ，「中宣部副部長 」，「行政院新聞 局局長」
胡健中	浙江 余杭	復旦大學新 聞系	1953.4- 1956.4	東南日報、中央日報 社長	「立委」，「中央 常務委員」
陶希聖	湖北 黃岡	北京大學法 科畢業	1956.5- 1972.8	中央日報總主筆	蔣介石侍從室少將 組長，「中宣部部 長」，「國民黨設 計委員會」主委， 「國民黨中央第四 組」主任
曹聖芬	湖南 益陽	中央政治學 校大學部新 聞系，美國 密蘇裏大學 新聞學院	1972.9- 1985.6	中央日報副社長，中 華日報社長，中央社 董事長	軍委會委員長侍從 室速記、秘書，國 民政府秘書，「總 統府」秘書，「中 央第四組」主任
林征祁	福建 閩侯	中央軍官學 校 15 期畢 業	1985.7- 1987.7	中央社駐外特派員， 中央社副社長、社長 ，香港時報董事長	國民黨黨史會副主 委

姓名	籍貫	教育背景	任職時間	職前新聞經歷	職前政治經歷
楚崧秋	湖南 湘潭	中央大學政治系，中央幹校研究部，革命實踐研究院，國防研究院畢業	1987.8- 1991.7	中央日報社長，中視董事長	南京國防部秘書及科長，「總統府」秘書，「國民黨中央第四組」副主任
莊懷義	台灣 台南	台灣師大教育系，紐約哥倫比亞大學教育行政碩士與博士	1991.7- 1994.5		「國民黨中央海外工作會」副主任，「國民黨中央文工會」副主任，「國民黨中青年會主任」
朱宗軻	浙江 吳興	政治大學新聞系	1994.5- 1995.12	中央日報總編輯 中視總經理	「行政院新聞局」處長，「國民黨文工會」副主任
徐抗宗	浙江 嘉興	美國印地安那大學政治學碩士，東吳大學法律系	1995.12- 2001.2		「國民黨中央青年工作會」副主任，「國民黨中央工作會」主任
邵玉銘	嫩江 蘭西	政大外交學系學士，芝加哥大學歷史學博士	2001.2- 2003.1		政治大學國關中心主任，「行政院新聞局長」，「國民黨中央副秘書長」
詹天性	臺灣 屏東	政大政治所碩士，中興大學行政學系	2003.1- 2006.5	中華日報社社長、董事長	「國民黨屏東縣黨部主委」，「中央黨部」總幹事，專任委員

附表二：中央日報臺灣時期歷任社長相關經歷與背景

姓名	籍貫	教育經歷	任職時間	職前新聞業經歷	職前政治經歷	離職去向
馬星野	浙江平陽	廈門大學，中央政治學校，密蘇裏新聞學院	1945.11-1952.8	開設政治大學新聞系，任系主任14年	中宣部新聞事業處處長，「中央執委」，「中央第四組」主任	任巴拿馬「大使」
胡健中	浙江余杭	復旦大學新聞系	1952.12-1953.3 1956.5-1961.5	東南日報，中央日報社長	「立委」，「中常委」	升董事長；中影董事長
蕭自誠	湖南邵陽	東南大學，中央政治學校	1952.8-1952.11	中央日報副社長	蔣介石侍從秘書，「中央改造委員會設委會主任」、「第四組」主任	國民黨發言人
陳訓恂	浙江慈谿	上海同文書院	1953.4-1954.2	香港國民日報，重慶中央日報主編，主持申報、南京中央日報復刊	上海市特別政府秘書，中宣部南京特派員	
阮毅成	浙江餘姚	法國巴黎大學法學碩士	1954.3-1956.4		中央政治學校創設法律系，教授兼系主任，浙江省民政廳廳長	「國民黨中央政策會」副秘書長
曹聖芬	湖南益陽	中央政治學校新聞系，美國密蘇裏大學新聞學院	1961.6-1972.8 1977.9-1978.2	中央社記者、副社長，中華日報社長	國民黨軍委侍從室秘書，「國民政府」秘書，「總統府副局長」，「中央第四組」主任	中央社董事長

姓名	籍貫	教育經歷	任職時間	職前新聞業經歷	職前政治經歷	離職去向
楚崧秋	湖南湘潭	中央大學政治系，中央幹校研究部第 1 期、革命實踐研究院、國防研究院	1972.9-1977.8	中華日報社社長	南京國防部秘書及科長，臺北「國防部總政治部設計委員」，「總統府」秘書，「中央第四組副主任」	轉任「國民黨文復會」副秘書長
吳俊才	湖南沅江	中央政治學校，印度裏德大學，倫敦政治經濟學院	1978.3-1979.1	中央日報駐重慶、新德里、倫敦特派員，香港航空版主任	「國民黨中央文工會」主任，「駐薩爾瓦多大使」	「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副秘書長
潘煥昆	廣東興寧	政治大學新聞系，密蘇裏大學新聞研究院	1979.6-1981.5	中央日報記者，中央通訊社編譯部主任，主筆，副總編輯，副社長	「亞洲生產力組織新聞處長」及「中華民國副理事」，「經濟部」顧問	轉任中央社社長
姚朋	河北宛平	政治大學新聞系，伊利諾伊大學新聞學碩士，國防研究院學員	1981.5-1986.12	臺灣新生報總編輯、副社長，中央日報副社長，總主筆	「中國青年工作會」委員	因中正機場事件報導去職
黃天才	廣西陽朔	政治大學畢業	1987.1-1988.4	民族晚報副總編，中央日報駐東京特派員，中央日報副社長		任中央社社長

黨報「轉型困境」的政治文化分析：以中央日報為中心

姓名	籍貫	教育經歷	任職時間	職前新聞業經歷	職前政治經歷	離職去向
石永貴	遼寧復縣	政大新聞系，新聞研究所碩士，明尼蘇達大學傳播學碩士	1988.4-1994.5	臺灣新生報總編輯、副社長，臺視總經理	「文工會」總幹事	中視總經理
唐盼盼	湖南邵陽	政治作戰學校新聞系，南伊利諾州立大學新聞學碩士	1994.5-1996.11	中央日報海外版主編及副總編輯，中廣總經理，中央社社長	「行政院新聞局敵情研究室」主任	提前退休
黃輝珍	台灣彰化	政治大學法律系	1996.11-1999.3	中國時報副總編、副總主筆，中央日報總主筆	財團法人「國家政策研究中心」執行長，「國民黨再造委員會」執委	「文工會」主任
詹天性	台灣屏東	中興大學行政學系，政大政治所碩士	1999.3-2001.1	中華日報社社長、董事長	「國民黨屏東縣黨部主委」，「中央黨部」總幹事、專任委員	中華日報社董事長
邵玉銘	嫩江蘭西	政大外交學系學士，芝加哥大學歷史學博士	2001.1-2003.1		政治大學國關中心主任，「行政院新聞局長」，「國民黨中央副秘書長」	文化大學教授

姓名	籍貫	教育經歷	任職時間	職前新聞業經歷	職前政治經歷	離職去向
劉繼先	北平	世新大學	2003.1-2006.6	中華日報社通訊組長、副總編輯、總編輯、副社長		

附表三：中央日報臺灣時期歷屆副社長、總編輯相關經歷與背景

姓名	籍貫	教育背景	職務	任職時期	職前新聞業經歷	職前政治經歷
唐際清	湖南武岡	南開大學歷史系，革命實踐研究院	副社長	1953-1961	天津益世報總編	
錢震	江蘇東海	政大新聞系，密蘇裏大學新聞學院	總編輯、副社長	1952-1961, 1961-1962	南京中央日報副總編輯	浙江縉雲縣長，天臺縣長，黃岩縣長
林家琦	山東	政治大學	總編輯	1961-	中央日報副總編輯	
趙廷俊	甘肅五都	政治大學新聞系	總編輯	1961-1971	中央日報資料室副主任、撰述委員，	
邵德潤	浙江衢縣	政治大學，美國斯坦福大學研究，國防研究院	總編輯	1961-		「行政院新聞局」顧問
薛心鎔	山東高密	政治大學新聞系	總編輯、副社長	1972-1979 1981-1985	採訪組主任、資料室主任、中央日報副總編	中央日報總主筆

黨報「轉型困境」的政治文化分析：以中央日報為中心

姓名	籍貫	教育背景	職務	任職時期	職前新聞業經歷	職前政治經歷
王端正	臺灣	政治大學新聞所碩士	總編輯	1985-1987	採訪組主任、副總編	
許志鼎	福建	政治大學新聞系	總編輯	1987-1994	中央日報記者、副總編	中央日報主筆
王曉寒	湖北黃岡	政治作戰學校	總編輯、副社長	1987-1994	中國郵報採訪部主任，民族晚報副總編，中華日報總編，中廣公司副總經理	
顏伯勤	上海	東吳大學	副社長	1987-1989	經濟新聞主筆、輔仁大學企管系教授	
魏瀚	湖北黃岡	世新大學	總編輯	1994-1996	中央日報副總編輯	中央日報主筆
劉本炎		東吳大學	總編輯	1996	中央日報主筆	
蔣震		成功大學中文系畢業	副社長	1994-1996	中華日報總編輯，中國時報美西版總編，中央社副社長	「文工會」總幹事
江偉碩	臺灣	政大外交系	總編輯副社長	1996-2006	中央日報專欄組組長、採訪組主任、副總編輯	

附表四：1970-1980 年代中期的黨外雜誌

創刊時間	創辦者及刊名
1975 年 8 月	黃信介、康寧祥等創辦《臺灣政論》創刊
1976 年 2 月 28 日	蘇慶黎創辦《夏潮》
1977 年 1 月 1 日	《這一代》創刊
1979 年 4 月 27 日	陳婉真、吳哲朗發行地下報《潮流》
1979 年 6 月	康寧祥等人創辦《八十年代》月刊
1979 年 8 月 16 日	黃信介等人創辦《美麗島》雜誌
1980 年 2 月	《八十年代》系列之《亞洲人》創刊
1980 年 4 月	《八十年代》系列之《暖流》創刊
1980 年 11 月	《海潮》創刊
1981 年 6 月	許榮淑創辦《深耕》系列雜誌
1981 年 10 月 25 日	周清玉創辦《關懷》月刊
1983 年 1 月	黃天福創辦《鐘鼓鑼》月刊
1984 年 3 月 6 日	鄭南榕創辦《自由時代》
1983 年 3 月 14 日	林正傑創辦《前進》系列週刊
1984 年 3 月 29 日	雷渝齊的《雷聲》創刊
1984 年 6 月 11 日	邱義仁、吳乃仁、劉守成等黨外新生代創辦《新潮流》
1984 年 6 月 12 日	黃天福的《蓬萊島》系列雜誌創刊

附表五：《中央日報》反台獨論述

社論標題	論述由頭	時間
台獨漢奸必歸消滅	蔣介石指責海外小撮台獨勢力與中共有關	1970.5.25
台獨分子還不快快悔過回頭	臺灣建國聯合陣線發表宣言	1980.2.20
揭穿中共對台獨招手的陰謀	鄧穎超發表告「臺灣同胞書」	1980.3.21
嚴斥叛亂嫌犯變相台獨的謬誤	美麗島事件案犯接受開庭審理	1980.3.22
無可置疑的幾個基本事實 嚴正辟斥「台獨」的謾言謬論	法院審理美麗島事件	1980.4.2
「台獨」是背棄民族大義的判徒	美麗島事件宣判	1980.6.3
美國將「台獨」列為國際恐怖分子	台獨聯盟在美被認定為暴力組織	1981.8.31
愛國愛鄉，粉碎「台獨」分化企圖	行政院就台獨聯盟問題發表談話	1982.7.10
完成中興大業的兩項要務—粉碎共匪統戰·清除「台獨」意識	行政院孫院長發表談話	1982.10.16
嚴防「台獨」破壞選舉的陰謀	台獨聯盟揚言破壞增額立委選舉	1983.11.18
應該與「台獨」劃清界線	《中央日報》出版《台獨想幹什麼》一書	1983.11.27
美國應將「台獨」首惡驅逐出境	台獨聯盟在《中央日報》和聯合報製造爆炸案	1983.12.13
守法，反共，與「台獨」劃清界線 任何政治團體都必須堅守的立場	中常會通過「人民團體組織法」等法案	1986.10.10
一定要與「台獨」劃清界線	海外台獨勢力猖獗	1986.12.5
鼓吹「台獨」是玩火自焚	俞國華在立法院答辭中強調反台獨	1987.11.4

社 論 標 題	論 述 由 頭	時 間
只有「反共產」、「反台獨」才有出路！—蔣主席重申基本國策的時代意義	蔣經國在中常會上強調「反共產」、「反台獨」	1987.11.26
「主張台獨」叛亂案宣判的重大意義	蔡有全許曹德因主張台獨被判刑	1988.1.17
「台獨」禍亡言行與中共之對應性危機	三項公職選舉期間「台獨」聲又起	1989.11.17
政府對「台獨行動」不能再姑息了	民進黨成立「臺灣主權獨立推進委員會」	1990.11.16
「民族自決」與「公民投票」，只是「台獨」把戲而已	民進黨成立「公民投票促進會」，鼓吹「進入聯合國」	1991.9.9
堅決明確依法制裁「台獨」——中國國民黨的聲明表明了大家的共識	國民黨發表反對民進黨將「台獨決議」納入「黨章」聲明	1991.11.17
全體選民一齊用選票來唾棄台獨暴力	民進黨指責中選會關於二屆國代選舉的決議違法	1991.11.29
明天，用你我的選票徹底根絕台獨暴力	二屆國代選舉期間民進黨進行暴力訴求	1991.12.25
包裝的「台獨」一中一台是條自絕的路	民進黨在立法院進行一中一台的總質詢	1992.10.16
爲了國家安全社會安定，我們必須堅守反共反台獨的原則	國民黨中常會通過國安法等修正原則	1992.4.30
民進黨的「台獨」新論是一項選舉花招	施明德提出民進黨執政，將不會宣佈台獨	1995.10.5
追求民主、反對共產、反對「台獨」——進一步解析總統直選結果所呈現的民意走向	1996 年總統直選揭曉	1996.3.25

附表六：1950-1970 年代初重大事件中的反共復國論述

事 件	論 述 內 容	時 間	出 處
舟山群島 撤兵	在反攻大陸時有更大的兵力；決不影響反攻的時間。	1950.5.16	舟山兵力的轉移
頒佈經濟 建設措施	我們建設臺灣就是為著堅厚反攻大陸的基礎。	1951.11.24	反攻大陸 與建設臺灣
開展文化 清潔運動	全自由中國的文化鬥士，要與俄帝共匪作積極的思想戰。	1954.12.10	堅持文化 清潔運動
劉自然事 件	正是匪徒們在自由中國煽起一個反美運動的大好機會。	1957.5.25	恢復理智 提高警覺
立法院通 過修訂出 版法	對防制與肅清赤色叛逆的顛覆工作，具有迫切的必要。	1958.6.13	出版法修 正案—其 法理與其 實際的必 要
八七水災	對於這次的天災，我們要看作是我們反攻復國艱苦奮鬥過程中的一次考驗……我們要用以消滅帝俄共匪的精神造成人禍的力量來戰勝未可預測的天災。	1959.8.11	展開救災 工作
雷震事件	以有系統的宣傳，鼓吹群眾暴動，但是這種言論已是有利於共匪。	1960.9.9	論雷震涉 嫌叛亂案
當局推行 文化復興 運動	共匪與我國文化為敵，根本違反了中國文化的傳統。	1966.11.14	展開中華 文化復興 運動
保釣事件	如果不是共匪叛亂，我們今天的國際地位如何？……我們理清了這些問題，才能處變不驚，雪恥圖強，以爭取隨後勝利，完成革命大業。	1971.6.19	知識青年 奮鬥的方 向

附表七：《中央日報》社論 1970 年代臺灣建設的經典論述

出 處	論 述	訴求重心	時 間
臺灣經濟發展的可喜成就	我們要在政治經濟各方面積極充盈國力，堅定國運操之在我的信心，把握對敵「有以待之」的準備，俾能無畏於一切的考驗與試煉。	強調建設臺灣在防衛上的意義	1971.8.7
由臺灣光復邁向大陸重光的大道	我們要以今日建設臺灣，造福民眾的成果，作為明日光復大陸、重建中華的藍圖；從遠處看，建設臺灣的目的，乃在於新中國的重建和世界真正和平的獲致。	建設臺灣以圖光復大陸、重建大陸	1972.10.20
和平、進步、繁榮與反共不可分	今天對共黨邪惡勢力的打擊，就是謀致和平、繁榮、進步的基本要圖。	建設臺灣以反共復國根本目標	1974.4.28
為自由、和平、生活而反共	每一滴汗水都是為了厚植國家的力量，來完成反共復國的總體目標。	建設臺灣對於反共的意義	1974.5.17
建設臺灣是光復大陸的基礎工程	今日臺灣不僅是經濟開發的典型，而且是反共的堅強堡壘，太平洋上民主自由的明燈。	建設臺灣使其成為反共復國的堡壘	1975.10.25
中國的出路就是實踐三民主義—申論加速整個中國大陸「臺灣化」的意義	以臺灣的模式、臺灣的經驗、臺灣的成就去號召全民，共同達成全國的統一，這是中華民國光復大陸國土的必然之路。	強調建設臺灣對於反共復國的必要性	1979.5.12

附表八：《中央日報》有關反台獨和認同臺灣論述中的邏輯脈絡，
1987-1999

出 處	經 典 論 述	訴 求 重 心	時 間
對「本土化」意識之平議	我們一方面要根植臺灣，一方面要放眼大陸，民主化才是超越一切地域、派系和小我私利之上的進步大道。	強調民主化在反對本土化方面的價值。	1987.10.13
國號豈容更改，憲法豈容更換！	反台獨是基於中國人的民族大義，基於全民的生存需要。	突出民族文化以及現實需要對於反對台獨的理由。	1989.11.11
切不可使你們的黨變成臺灣人的黨	台獨分子：昧於國家民族意識，惑於政治野心和個人權欲。	從歷史、民族、文化以及現實利益的面向批判台獨。	1990.12.20
以自信、互信與共信，走出生命共同體的光明大道	台獨不符合民族情感道義，又復違背國家現實利益，是一條走不同的死路。	突出民族情感、現實利益以及發展前途等在反台獨上的依據。	1993.5.23
讓我們奮鬥在一起，歡樂在一起，成功在一起	生命共同體是中華民國過去在復興基地得以生存茁壯的關鍵，也是今後我們堅定民主信仰期之昌盛宏大的力源。	突出認同臺灣的理由在於歷史價值及其民主潛力。	1993.8.4
落實主權在民，形成生命共同體	主權在民是我們推動民主化的根據，凝聚生命共同體是我們推動民主化的目標。	突出生命共同體的民主價值。	1994.6.14

出 處	經 典 論 述	訴 求 重 心	時 間
臺灣已成爲中國現代化文明發展的新動力	沒有臺灣就沒有中華民國；萬萬不可無視於中華民國是一臺灣爲基地這一事實；認同臺灣是保護中華民國的著力點；臺灣已經成爲現代文明社會，到處生機蓬勃，充滿活力；已經孕育出一種嶄新的文化生機，成爲中國文化的新中原。	突出臺灣的現存事實，強調認同臺灣對於中國的意義，以及臺灣自身的新文化。	1995.1.19
以生命共同體意識建構清新社會	不論是誰，都有一個生活的中心，工作的中心，從而也都屬於一個社區，一個社會，一個國家，而民主化使大家都能成爲一個國家的主人，也都能成爲生命共同體的一部分。	突出生活場所和民主價值對於臺灣認同的意義。	1996.3.10
認同臺灣的人應當被臺灣認同	認同臺灣的理由是只有臺灣才能提供生活和生命的內涵。	突出認同臺灣在於其自由民主方面的價值。	1996.8.4
面向光明的「新臺灣人」論述	臺灣是我們共同的家園，我們生活在這裏，工作在這裏，未來的發展也在這裏。	強調生活場所上的關係；具體生活中的事實。	1998.10.28
進一步發揚「新臺灣人」意識	將臺灣建設成代代子孫安身立命，中華民國永續經營的美好家園。	突出臺灣的生存發展含義。	1998.12.3
新臺灣人主義	今後生活在臺灣的所有人民，可以掌握住自己的前途命運；是不分先來後到，不分語言地域，統括生活在此地，效忠於此地的所有人民，作爲一個生命共同體的身份認同。	突出場所以及由此帶來的身份特徵，化約了歷史和文化傳統的含義。	1998.12.09

出 處	經 典 論 述	訴 求 重 心	時 間
臺灣已經 堅強站起 來了	臺灣不可能成為國際交換的籌碼，已經站起來了。	強調民主化在臺灣認同中的價值。	1999.1.13

附表九：本文主要訪談對象一覽

姓 名	職 務	訪 談 時 間	訪 談 地 點	探訪者
薛心鎔	中央日報原總編輯、副社長	2007年6月18日 下午	臺北忠孝東路薛心鎔先生家中	唐海江
石永貴	中央日報原社長	2007年11月7日	臺北石永貴先生家中	唐海江
孫如陵	中央日報原副總編輯，中央副刊主編	2007年10月28日 下午	臺北新店中央新村孫如陵先生家中	唐海江
馬西屏	中央日報原採訪組主任、副總編輯	2007年7月18日 上午	政治大學行政大樓教授休息室	唐海江
魏 瀚	中央日報原總編輯	2007年11月2日 下午	臺灣立報總編輯室	唐海江
潘家慶	政治大學新聞系教授	2007年6月12日 上午	政治大學傳播學院	唐海江
成露茜	世新大學新聞系教授	2007年6月至12月 多次	世新大學舍我紀念館	唐海江
江偉碩	中央日報原總編輯，中央日報網路報社長	2007年5月22日 下午	中央日報網路報編輯部	唐海江
周慶祥	中央日報原採訪組主任	2007年11月25日	政治大學休閒廳	唐海江

Analysis on the Transformation Dilemma of Political Party's Newspapers in Taiwan —Take Central Daily News as an Example

Jiang Hai, Tang *

ABSTRACT

This paper primarily focuses on the problems of transformation dilemma of political party's newspapers. Central Daily News, one of the a few major political party's newspapers, has been experiencing frustration regarding its general marketing while the society has been marching toward democracy. Without discussing the aspects of mass media system policy and power struggle issues, this paper is more interested in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political cultural factors and the transformation dilemma of the Central Daily News.

The analyses are constructed from the point of views on a specific political party and the organization format of the party's newspaper, and how they are related to the culture and society of Taiwan.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newspaper organization and the political party has always been based on the traditional ideation of authoritarianism which has always been the core policy of how political culture is managed in Taiwan. However, on the other hand, some radical members in the society at the same time have

* Dr. Hai-Jiang Tang is currently a research fellow at Shih Hsin University, Taiwan and a professor at the college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s of Hu Nan University, China.

been trying to revolt such a tradition by declaiming against authoritarianism and mobilizing democratism. Under this condition, the content of Central Daily News seems to be meaningless and lack of the kind elements the society has requested for. In other words, the newspaper marketing mechanism has faced the dilemma of whether follow through the tradition of its authoritarian system or adapt to the trend of democracy among the field of mass media. Finally, the paper also raises the suggestions of the solution for the transformation dilemma of political party's newspapers; that is, the policy system should be more exoteric and negotiable in order to accommodate the needs for democracy in the society.

Keywords: party newspaper 、 transformation dilemma 、 political culture 、
Central Daily News

• 新聞學研究 • 第九十七期 2008 年 10 月